

# 辽代进士释褐后的初授官职与迁转

李慧娟<sup>1</sup> 高福顺<sup>2</sup>

(1. 长春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32; 2. 吉林大学 历史系,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辽朝进士及第后, 经铨选试合格后方能释褐任官。释褐进士任官程式是初授官秩, 为校书郎或著作佐郎, 并授予阶官, 阶品较低。校书郎或著作佐郎执掌修文或校讎典籍某一时间后方可迁转任官, 其迁转路径大体有二: 一是朝中为官, 初授枢密院令史, 二是地方为官, 初授州军事判官, 两者均为低级官职。释褐进士由低级向高级官职迁转依据考课, 快慢不一, 治世优秀者可越级升迁, 官至宰执, 治世平庸者终滞小官, 甚至湮没无闻。辽朝及第进士释褐任官带有明显的北方游牧民族特色, 但其程式主要还是承袭唐、五代制度。

**关键词:** 进士; 释褐; 任官; 迁转; 仕宦; 辽代

**中图分类号:** K24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5) 07-0113-07

关于辽朝释褐进士任官问题, 最早讨论者乃台湾学者杨树藩先生,<sup>①</sup> 尔后, 都兴智、张希清、李桂芝以及日本学者高井康典行等先生在研究辽朝进士时均涉及此问题。<sup>②</sup> 新近, 蒋金玲先生就进士的初授官职、官职迁转、最终官职等作了较系统的探讨。<sup>③</sup> 本文拟就辽代进士释褐后的初授官职与迁转诸问题略作探讨, 以进一步揭示辽朝释褐进士任官的群体面貌。

从目前所查阅的有进士姓名者的 114 位有宦历的辽朝进士看, 宦历所记第一官职相对比较繁芜, 不过, 经仔细缕析, 进士宦历所记第一官职往往并非皆为初授官职, 可能是宦历资料记载阙如过甚造成的。兹从下面几条史料的对比可见些端倪:

1. 杜防, “开泰五年, 擢进士甲科, 累迁起居郎、知制诰。”<sup>④</sup>
2. 梁援, “清宁五年, 登甲科。初命儒林郎、守右拾遗、直使馆, 历左补阙、起居郎, 充史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13FZS005)。

**作者简介:** 李慧娟, 长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中国政治制度史; 高福顺, 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 研究方向: 辽金史、东北民族史。

<sup>①</sup> 杨树藩:《辽金贡举制度》, 载《宋史研究集》第 7 辑, 台北: 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1974 年, 第 115-149 页; 杨树藩:《辽金贡举制度》,《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 5 期, 1973 年。另, 关于该文作者,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辽金中央政治制度》则署名为“杨树藩”。

<sup>②</sup> 都兴智:《有关辽代科举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1991 年第 2 期; 都兴智:《辽金史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第 12-21 页; 张希清:《辽宋科举制度比较研究》, 载张希清等主编:《10—13 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第 85-113 页; 李桂芝:《辽金科举研究》,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第 38-90 页; 高井康典行:《辽朝科举与辟召》, 程妮娜译,《史学集刊》2009 年第 1 期。

<sup>③</sup> 蒋金玲:《辽代进士仕宦问题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 年第 3 期。

<sup>④</sup> 《辽史》卷 86《杜防传》。

馆修撰。”<sup>①</sup>

3. 马人望,“咸雍中,第进士,为松山县令。”<sup>②</sup>

4. 贾师训,“三十有五,登第。授秘书省著作佐郎,调恩州军事判官。充东京鞠院使。服阕,授奉玄县令。”<sup>③</sup>

5. 吕嗣延,“举□(寿)昌中进士,历安德州、中京内省判官,丰、应二州观察判官,中京留守推官,滦河、遵化二县令。”<sup>④</sup>

就1、2两条史料而言,杜防宦历所记第一官职为“起居郎”<sup>⑤</sup>,而梁援宦历所记的第一官职为直使馆,此后才迁转至起居郎,充史馆修撰。按正常授官迁转实态推断,皆为进士甲科的杜防、梁援,初授官职应大体相当,级别相差不会很大,兹至少说明起居郎为杜防释褐后的初授官职的可能性不大。再分析3、4、5三条史料,马人望宦历所记第一官职为松山县令,同样登第的贾师训历迁恩州军事判官、东京鞠院使之后才授奉玄县令。寿昌进士吕嗣延,也是历迁安德州、中京内省判官、丰州、应州观察判官、中京留守推官之后才迁转滦河、遵化县令。如同起居郎的认识,松山县令为马人望释褐后的初授官职的可能性也不大。此外,从前文提及的重熙五年殿试进士看,除冯立外,赵徽以下皆授太子中舍,事实上,能检索到的同科殿试进士赵徽、姚景行、刘伸的宦历所录第一官职皆非太子中舍,如赵徽记述为“重熙五年,擢甲科,累迁大理正”<sup>⑥</sup>,而姚景行则记述为“重熙五年,擢进士乙科,为将作监,改燕赵国王教授”<sup>⑦</sup>,刘伸亦记述为“重熙五年,登进士第,历彰武军节度使掌书记、大理正,擢枢密都承旨,权中京副留守”<sup>⑧</sup>。尽管重熙五年的初授官职是特例,但通过史料对比却证明了进士宦历中所记第一官职并非均是初授官职这一历史事实。故考察辽朝进士释褐的初授官职时,不能将释褐进士宦历中所记第一官职均视为初授官职。

辽朝进士初授官秩秘书省校书郎或著作佐郎一段时间后,均要面临迁转问题。从目前可确知有初次迁转记录的29名进士统计看,<sup>⑨</sup>以迁转州军事判官者为最多,有王泽、张绩、杨遵勖、王鼎、郑恪、贾师训、大公鼎、康公弼、孟初、甯鉴、杜念、梁颖、王用极、时立爱<sup>⑩</sup>等14人,迁转巡捕官者有室防1人,州文学参军者有常遵化1人,节度使掌书记有刘伸1人,都商税判官者有史洵直、

① 孟初:《梁援墓志》,载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20页。

② 《辽史》卷105《马人望传》。

③ 杨□:《贾师训墓志》,载林荣华校编:《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7273页上栏。

④ 赵拯:《吕嗣延墓志》,载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鲁谷金代吕氏家族墓葬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69页。

⑤ 起居郎始建于隋朝,初称“起居舍人”。唐贞观二年将其移入门下省,始称“起居郎”,从六品上。据《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记载:“起居郎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授之国史焉。”

⑥ 《辽史》卷97《赵徽传》。

⑦ 《辽史》卷96《姚景行传》。

⑧ 《辽史》卷98《刘伸传》。

⑨ 日本学者高井氏对辽朝统和六年以后的出初任官曾做过统计,总为26名。与笔者统计相较,剔除了统和六年以前的室防、常遵化,而漏录了杨遵勖、刘伸、梁颖、王用极、吕士安、史克忠和张通古等进士,而对梁援所任直史馆、史馆修撰、状元王鼎所任易州观察判官、孟有孚的知泰州乐康县、马人望所任松山县令、曹永义所任长春县令、韩昉的史馆修撰等确认为初任官职。另,吕德懋宦历未录“檀州军事判官”,张俭的初转官职为顺州从事而非顺州军事判官,但将时立爱的州幕官、王安裔的签书涿州军伴公事、邓中举的倅营州军州事等同于“州军事判官”无疑是正确的。参见高井康典行:《辽朝科举与辟召》,程妮娜译,《史学集刊》2009年第1期。

⑩ 关于时立爱,《金史》卷78《时立爱传》载:“辽太康九年,中进士第,调泰州幕官。”辽朝地方州“幕官”包括判官、巡捕官、参军、掌书记等职官由唐五代的幕职官发展演变而来,但又异于唐代幕府官的属性,而与宋代幕府官的属性相近。参见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赖瑞和:《唐朝基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不过,《时立爱墓志》云:“以大康九年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校书郎,泰州军事判官。”据此墓志,本文统计释褐进士初次迁转时将时立爱归入“州军事判官”,而非“州幕官”。参见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新城县北场村金时立爱墓发掘记》,《考古》1962年第12期。

张衍等2人,州从事者有张俭1人,<sup>①</sup>签书涿州军倅公事者有王安裔1人,倅营州军州事者有邓中举1人,燕京留守祗候者有吕士安1人,<sup>②</sup>积庆宫都部署判官者有史克忠1人。另,迁转枢密院令史者有尚暉、王师儒、张通古、任熊祥等4人,中书省令史者有耶律(李)俨1人。以此观之,进士释褐授官后初次迁转主要有两个路径:一是派遣地方,任职地方官员,“试职于外”<sup>③</sup>,此为绝大多数;二是留守朝廷,任职朝廷官员,此为较少一部分。在地方官职中,任职“州军事判官”居多,若将张俭、吕士安亦归入军事判官类,则军事判官之职占差遣地方官职的66.67%,任职其他职位者或为4.17%或为8.23%。在朝官职中,主要任职于“令史”,多为枢密院令史,有初授官职记录者无一例外。由此判断,释褐进士初授官职以“州军事判官”和“枢密院令史”为常态。辽朝进士的此种任职方式与唐朝进士官职迁转路径大体相通,亦微有差别。<sup>④</sup>

在唐代,州军事判官为流外官,无散官阶,而辽朝则带有官阶。如郑恪“授松山州军事判官,加文林郎”,而撰《郑恪墓志》(大安六年)的李谦贞则署衔“宾州军事判官、文林郎、试秘书省校书郎”<sup>⑤</sup>。撰《王瓚墓志》(统和三年)的董□署衔为“滦州军事判官、文林郎、试大理评事”<sup>⑥</sup>。撰《祐唐寺创建讲堂碑记》(统和五年)的李仲宣官衔为“知蓟州军事判官、文林郎、试秘书校书郎”<sup>⑦</sup>。撰《刘宇杰墓志》(统和十八年)的王用极署衔为“前滦州军事判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sup>⑧</sup>。《大佛顶微妙秘密陀罗尼幢记》(统和十四年)则载有“檀州军事判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吕德懋”<sup>⑨</sup>。前文已指出,将仕郎相当于唐朝文散官的从九品下,而文林郎则相当于唐朝文散官的从九品上,可见辽朝州军事判官与唐五代相比确实出现了很大变化,不仅由朝廷差遣,而且还带有官阶。

有关令史的官秩,虽然《辽史》载有“定诸令史、译史迁叙等级”记事,<sup>⑩</sup>但令史对应的官秩却未明载。不过,在常态下令史对应的官秩可能是太子洗马,如孟有孚之弟有常为“太子洗马、枢密院令史”<sup>⑪</sup>,而撰《添修缙阳寺功德碑记》的郑昉署衔为“枢密院令史、太子洗马”<sup>⑫</sup>。另,咸雍二年屈于丙科的王师儒,“特授将仕郎、守秘书省校书郎。执政者惜公徒劳于州县,擢充枢密院令史。(咸雍)六年夏,加太子洗马”<sup>⑬</sup>。杜愈“(大康)七年,□宣充枢密院令史。九年加太子洗马”<sup>⑭</sup>。而太子洗马对应的阶官当为承务郎或儒林郎,如房山《宝星陀罗尼经》大康十年题记、《善思童子经》大安二年题记、《持世经》大安二年题记中的齐穀均署衔为“军事判官、承务郎、太子洗马”<sup>⑮</sup>。

① 日本学者高井康典行、台湾学者赖瑞和先生皆认为“从事”是藩镇幕职官的泛称,主要包括副使、行军司马、判官、掌书记、推官、巡官、衙推、要籍、随军等。高井氏的观点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过,辽朝中后期的“州从事”在性质上与唐五代藩镇幕职官还是有差别的,应给予关注。

② 吕士安在充燕京留守祗候一年后,亦迁转为归化州军事判官。

③ 耶律兴:《梁颖墓志》,《文史》2011年第1辑。另,梁颖“试职于外”的官职为蓟州军事判官。

④ 赖瑞和先生认为:唐代进士释褐后初授官职,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至府州任参军,或在外县任县主簿或县尉,中晚唐更有人到外地幕府任推官、巡官等职;二是留守都城任校书郎、正字。参见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4页。

⑤ 李谦贞:《郑恪墓志》,载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28页。

⑥ 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1页。另,董□:《王裕墓志》时亦署衔为“滦州军事判官、文林郎、试大理评事”。参见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2页。

⑦ 《辽史拾遗》卷21《李仲宣传》引《盘山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00页。

⑧ 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06页。

⑨ 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续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3页。

⑩ 《辽史》卷24《道宗本纪四》。

⑪ 孟初:《孟有孚墓志》,载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71页。

⑫ 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64页。

⑬ 南扑:《王师儒墓志》,载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45页。

⑭ 郑□□:《杜愈墓志》,载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续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4页。

⑮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等编:《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35、342、345页。

王师儒咸雍六年夏加太子洗马后,“是岁冬,遽迁儒林郎、直史馆”<sup>①</sup>。承务郎相当于唐朝文散官的从八品下,儒林郎相当于唐朝文散官的正九品上。<sup>②</sup>兹说明令史不仅留居朝中任职,而且官阶、官秩又比州军事判官为高,堪称差遣中的美职。

就“试职于外”的进士而言,初授官职考满后其迁转分为二途:一是回归朝廷,主要充枢密院令史。众所周知,辽代官制分北、南面官,南面官虽“用唐制”<sup>③</sup>,但又与唐制稍有差别。枢密院令史作为南枢密院的文职官员,又是差遣中的美职,因而受到释褐进士的青睐,当进士试职于外考满后均愿赴此职。辽朝释褐进士履职枢密院令史,当始于圣宗时代。如王泽试职于营州军事判官后,宣充枢密院令史。对此,为其撰写墓志铭的次子王纲评论曰:“进士隶院职,自父始也。”<sup>④</sup>自王泽之后,释褐进士于地方履职考满后充当枢密院令史者多见于史料记事中,如康公弼任职武州军事判官后,“辟枢府令史”<sup>⑤</sup>。梁颖于清宁六年“入掾局为书令史,写翰行遣皆出流辈”<sup>⑥</sup>。杜恂履职檀州军事判官后,“宣充枢密院令史”<sup>⑦</sup>。甯鉴以敦睦、弘义、延昌宫判官的职位“特旨枢密院令史”<sup>⑧</sup>。吕士安在锦州永安县令上“未及考,促赴枢密院,充书令史。十六年,迁兵房令史”<sup>⑨</sup>。曹勇义除长春令后,于“枢府辟令史”<sup>⑩</sup>。二是仍居外为官,任职地方。如刘仲登进士第后,历彰武军节度使掌书记、权中京副留守、西京副留守、三司副使、南京副留守、上京留守。<sup>⑪</sup>郑恪举进士中第三甲历松山州军事判官、贵德州节度副使、东京供贍都监、知上京盐铁副使。<sup>⑫</sup>同样,贾师训历恩州军事判官、东京鞠院使、奉玄县令、锦州永安县令、中京留守推官,终生在外(地方)履职。<sup>⑬</sup>

辽朝释褐进士迁转虽可分“朝职”与“外职”二途,但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居于外职的进士迁转绝大多数并非终生外职,依据考课,入为朝职者大有人在。如杨佖,出知易州后,入为翰林学士。<sup>⑭</sup>张俭历顺州从事、云州幕官、范阳令后,入为知制诰、直枢密院、知枢密直学士、枢密直学士、宣政殿学士、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使。<sup>⑮</sup>同样,在朝充令史者也会赴外任职,如耶律(李)俨,咸雍登进士第后,守著作佐郎,补中书省令史。大安元年出为景州刺史。大安二年又同知宣徽院事,提点大理寺。大安六年冬改山西路都转运使。寿隆初入授枢密直学士、拜参知政事。<sup>⑯</sup>杨佖、耶律俨的差遣于外与入朝迁转的历程说明辽朝释褐进士迁转分途并非像唐朝那样清晰。

① 南汭:《王师儒墓志》,载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45页。

② 唐统天:《辽代汉官的散阶制》,《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3期。

③ 《辽史》卷47《百官志三》。

④ 王纲:《王泽墓志》,载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60页。

⑤ 《金史》卷75《康公弼传》。

⑥ 《文史》2011年第1辑。

⑦ 郑□□:《杜恂墓志》,载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4页。

⑧ 虞仲文:《甯鉴墓志》,载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06页。

⑨ 赵渊:《吕士安墓志》,载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鲁谷金代吕氏家族墓葬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54页。

⑩ 《金史》卷75《曹勇义传》。

⑪ 《辽史》卷98《刘仲传》。

⑫ 李谦贞:《郑恪墓志》,载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28页。

⑬ 杨□:《贾师训墓志》,载林荣华校编:《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7273页上栏、17274页上栏、17274页下栏。

⑭ 《辽史》卷89《杨佖传》。

⑮ 杨佖:《张俭墓志》,载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66-267页;《辽史》卷80《张俭传》。

⑯ 《辽史》卷98《耶律俨传》。

## 二

辽朝进士迁转“州军事判官”或“令史”等低级官职后，继续向高职迁转。在迁转的过程中，常会“授”或“加”各种官衔，除前面涉及的官、职、阶外，还常“授”或“加”散官、勋、爵、封、宪等官衔，如《冯从顺墓志》（太平三年）叙录冯从顺宣历时对官、阶、勋、散官、爵、封等区分得就较为清楚：“其历官自西头供奉，至颁给副使、颁给武德皇城等使，两任知内承宣事、中上两京内省使、延州观察使、敦睦宫汉儿渤海都部署、归义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上京户部使。阶自银青，至金紫。勋自武骑，至上柱国。散官自国子祭酒、工部尚书，至司空、太傅、太尉。爵自男，至开国侯。封至一千户，实封一百户。”<sup>①</sup>对于辽朝官阶制度，唐统天、王曾瑜等先生皆做过系统研究，<sup>②</sup>王曾瑜先生研究后指出：“辽朝确有官品制度，今已难知其详。辽朝的官品与官、阶、勋、散官、爵、封、宪衔等之间，自然有一定的组合关系和制度，尽管也会有特例和破格的情况，今亦不知其详……各级官员按其官品、官名等，有一定的高低座次，今又不知其详。至于各级各类官员的升迁、降黜、考课等等制度，依据今存史料，已难于了解其概况，更何况是详情了。”<sup>③</sup>辽朝官制十分繁芜，加之记载阙略，虽然王先生依据唐、宋官制以及辽朝官制的零散记事梳理出头绪，使辽朝官制研究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最近，陈晓伟先生又以新出土的《梁颖墓志》所载官制为核心对“辽朝文官阶制”（笔者在前文将之称为“官秩”）作了有益探讨，复原出辽朝文官约四十余阶。<sup>④</sup>不过，正如作者所云：“这仅能反映其大概情况”，“罗列的个别官秩次还可能存在错置的情况。”<sup>⑤</sup>有鉴于此，缕析辽朝进士迁转实态的难度可想而知。

众所周知，考察辽朝进士迁转的最佳选项当然是官职（执掌）。官职迁转乃是所有官衔中的重中之重，是最能体现官员执政能力的标志。因辽朝未能留下完整序列的官职记录，而官职迁转又受晋升黜降的影响，如梁援，“大康元年冬，权诸行宫副部署，兼判三班院。大康五年，改宁昌军节度。六年，授户部使、静江军节度。八年，改天城军节度使。十年，再授翰林学士。大安初，复拜诸行宫副部署。六年冬，□上京留守临潢尹事。九年，知宣徽南院使事。寿昌元年，知武定军节度使。三年，再授诸行宫都部署。五年，判辽兴军节度使事。六年夏，拜枢密副使，签中书省事。冬十月，知枢密院事。”<sup>⑥</sup>梁援不仅有多次知节度使的经历，而且“再授”、“复拜”也时常发生，虽然总体是由低级官职向高级官职升迁，但中间经常出现升迁降黜现象，无法寻知迁转的序列性（规律性），故以官职视角考察辽朝进士迁转实态实难行得通。此外，从官秩视角考察辽朝进士迁转实态亦较为合适，就仕

① 罗福颐校录：《满洲金石志补遗》，载林荣华校编：《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7458页下栏。

② 唐统天：《辽代汉官的散阶制》，《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3期；唐统天：《辽代勋级、封爵和食邑制度研究——补〈辽史·百官志〉》，《东北地方史研究》1990年第2期；王曾瑜：《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载《凝意斋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4-129页。

③ 王曾瑜：《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载《凝意斋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7页。

④ 陈晓伟先生梳理出的辽朝官阶为：秘书省正字→崇文馆校书郎→太子校书郎→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著作佐郎→秘书省著作郎→秘书郎→试大理评事→大理寺丞→大理司直→太子中舍→太子中允或太子洗马→太子洗马→秘书丞→殿中丞→太常丞→右拾遗→左补阙→某部员外郎→左司员外郎→某部郎中→左司郎中、右司郎中→将作少监→少府少监→秘书少监→太府少卿、太仆少卿→太常少卿→将作监→少府监→司农卿、卫尉卿、大理卿→昭文馆直学士→左谏议大夫→给事中→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左散骑常侍→某部侍郎→尚书左、右丞→某部尚书→尚书左、右仆射。

⑤ 陈晓伟：《辽朝文官阶制再探》，载刘宁、张力主编：《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608-617页。

⑥ 孟初：《梁援墓志》，载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20-522页。

宦叙录而言,除官职的叙录最为受到重视外,其次便是官秩,有较详宦历的进士均有较详的官秩叙录,<sup>①</sup>如贾师训的官秩迁转顺序为:大理寺丞→太子洗马→秘书丞→鸿胪少卿→太常少卿→右谏议大夫→礼部侍郎→尚书左仆射。<sup>②</sup>孟初的官秩迁转顺序为:秘书省校书郎→右拾遗→尚书左司员外郎→司勋郎中→左司郎中→中书舍人→□谏议大夫→礼部侍郎。<sup>③</sup>梁颖的官秩迁转顺序为:著作佐郎→太子中舍→太子□□→□中丞→太常丞→尚书礼部员外郎→尚书职方郎中→将作少监→太仆少卿→少府监→昭文馆直学士→谏议大夫→给事中→□□□学士→宣政殿大学士→刑部尚书。<sup>④</sup>从上述三人的官秩叙录看,他们的官秩叙录是不完整的,如贾师训叙录的“大理寺丞”显然并非初始官秩,有漏叙现象。同样,孟初的秘书省校书郎至右拾遗、梁颖的著作佐郎至太子中舍的中间也存在漏叙现象。<sup>⑤</sup>况且,诚如陈晓伟先生所言,目前对辽朝官秩序列的研究尚未有定论,很难排列出一个准确的官秩序列和等级。很显然,以官秩为中心考察进士迁转亦难行得通。就目前辽朝官制实态论之,官阶制度是考察释褐进士迁转最为值得信赖的“标杆”。其信赖的依据就是官阶制度有相对系统而完整的序列,如《张绩墓志》(清宁九年)载张绩于景福秋解褐授官后,其阶官自将仕郎,历文林郎、登仕郎、儒林郎、承务郎、承奉郎、征事郎、给事郎、宣义郎、朝散郎、宣德郎、朝请郎、通直郎,直至奉义郎。<sup>⑥</sup>这与唐朝低层的文散官阶序相当吻合,也与唐统天、王曾瑜等先生研究的结论相一致,唯“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和“银青光禄大夫”,因避太宗德光名讳,分别改称崇禄大夫、金紫崇禄大夫和银青崇禄大夫。<sup>⑦</sup>故此,目前考察辽朝进士迁转唯以“阶官”为中心,再参以官秩、官职、官阶在一般实态下成正比例关系,可大体寻知进士迁转的基本实态。

### 三

纵观辽朝进士阶官迁转实例,其迁转速度快慢不一。<sup>⑧</sup>前文提及的张绩景福元年(1031)秋入仕授将仕郎至重熙十九年(1050)冬授奉议郎,20年迁转14阶。郑恪于清宁八年(1062)中第三甲,大安六年(1090)卒时为“朝散大夫”<sup>⑨</sup>,28年迁转17阶。张俭于统和十四年(996)冠进士甲科,至开泰五年(1016)秋“加开府仪同三司”<sup>⑩</sup>,21年迁转29阶。梁援清宁五年(1059)登甲科,至寿昌六年(1100)十月“加开府仪同三司”<sup>⑪</sup>,42年迁转29阶。王师儒咸雍二年(1066)举进士,

① 与叙录官秩现象相反,有官秩叙录者未必有官阶叙录,而有官阶叙录者必有官秩叙录,这说明在辽朝人的心目中,官秩比官阶更为重要些。

② 杨□:《贾师训墓志》,载林荣华校编:《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7273页下栏、17274页上栏、17274页下栏。

③ 虞仲文:《孟初墓志》,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7-298页。

④ 耶律兴:《梁颖墓志》,《文史》2011年第1辑。

⑤ 当然,也不排除越秩迁转的特殊情况,但从唐、宋官制的比较看,这种大幅度越秩的可能极小。

⑥ 李三收:《张绩墓志》,载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13-314页。另,缘于《张绩墓志》缺损,不见“给事郎”与“通直郎”的记载,但这两个官阶可依据上下文推测出来。如张绩于重熙十二年为征事郎,“十三年正月”至“郎”字间有三个空格,而下文云他于“当年冬以案空加宣义郎”,按照唐统天、王曾瑜等先生研究的结论,征事郎与宣义郎之间唯为“给事郎”。又如“朝请郎”与“奉义郎”之间约缺十余字,但此两阶间唯有一阶,当为“通直郎”。但朝请郎与奉议郎之间却录有重熙十七年冬“改授兴国军节度副使、银青崇禄大夫(约缺十余字)骑都尉”字样,授“银青崇禄大夫”很显然是误录,因为张绩的阶官于重熙十九年才升至奉义郎,相差十分悬殊。

⑦ 唐统天:《辽代汉官的散阶制》,《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3期。

⑧ 近日,蒋金玲先生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3期发表了《辽代进士仕宦问题考述》一文,对辽朝进士迁转问题作了有益探讨,对本文关于进士迁转的研究有很大帮助。

⑨ 李谦贞:《郑恪墓志》,载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28页。

⑩ 杨佺:《张俭墓志》,载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65页。

⑪ 孟初:《梁援墓志》,载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20页。

屈于丙科，特授将仕郎，至大安八年（1092）冬“阶升崇禄大夫”<sup>①</sup>，27年迁转27阶。吕士安重熙七年（1038）御前进士及第，至大康八年（1082）“加崇禄大夫”<sup>②</sup>，45年迁转27阶。在不同阶段，迁转的速度不尽然，如王师儒自将仕郎至儒林郎用了4年迁转4阶，从儒林郎至朝散大夫用了7年迁转13阶，从朝散大夫至大（太）中大夫用了12年迁转5阶，从大（太）中大夫至崇禄大夫用了3年迁转5阶。吕士安自进士及第迁转至朝议大夫用了25年迁转18阶，而从朝议大夫迁转到崇禄大夫用了19年迁转9阶。可见，不仅每个人的迁转速度存在差别，就是同一个人的不同阶段的迁转速度也存在差异。由于迁转快慢不同，致使诸多释褐进士滞于中层官僚，甚至有的进士滞于基层官僚。可以想见，那些未留下只言片语的进士，尤其是状元，如高举、郑云从、李可封、史简、文充等，<sup>③</sup>很可能就是缘于滞停基层官僚，身份卑微，甚至述史者未能叙上一笔，导致其仕宦、事迹湮灭无闻。

导致进士迁转快慢的主要原因可能与其儒术博洽、治世政绩相关。如王师儒“接伴宋使钱勰者，南国之闻人也。在驿涂，相与论六经子史及天文□□山海异物医卜之书，公无不知者。闻其讲贯，一皆输伏。”“任枢密副使时，适知燕民歉乏，力奏赈之。而主计者过□□吝官粟，以状上闻，谓粟价腾踊，不可贱出。以是未允其奏，余无肯言者。公再三为请，上悟之，深所嘉纳，燕民赖之济活者数百万。”因王师儒有“直道、纯德、懿文、朴学”集于一身，“上为天子辅，次为王者师”的资历，<sup>④</sup>官阶迁升的速度相对较快，达到一年一迁转的快速状态。张俭能够21年迁转29阶，也缘于其深邃儒学与治世功绩，史载“历官三十一次，作相二十一考，功臣至一十字”，<sup>⑤</sup>以至元朝史家给予“名符帝梦，遂结主知。服弊袍不易，志敦薄俗。功著两朝，世称贤相，非过也”<sup>⑥</sup>的评论。

释褐进士的迁转依据谙熟儒家经典程度与考课政绩的认可度循着由低至高的方向递进式迁转，任职较多者有宰相、枢密使、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平章事、学士、知制诰、史馆修撰、监修国史、起居郎、令史、舍人、留守、副留守、节度使、节度副使、府尹、刺史、县令、州事、推官、（都）部署等，具有鲜明的文官特色。

责任编辑：尚永琪

① 南汴：《王师儒墓志》，载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46页。

② 赵渊：《吕志安墓志》，载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鲁谷金代吕氏家族墓葬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54页。

③ 高福顺：《辽朝历科状元考论：以圣宗统和六年以后开科考试为中心》，载《科学学论丛》第2辑，上海：线装书局，2011年。

④ 南汴：《王师儒墓志》，载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46-647页。

⑤ 杨佺：《张俭墓志》，载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68页。

⑥ 《辽史》卷80《张俭传》。